

孔子是造反派 还是保守派？

杨 宽

河南人民出版社

孔子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3年11月第1版 197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统一书号 3105·160 定价 0.05 元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年——前四七九年）究竟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还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是顺着时代潮流前进的造反派，还是主张开倒车的保守派？这是长期以来争论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没有彻底解决。

最近杨荣国同志发表了《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从孔子的政治立场和他的思想——“仁”作出的论断，是正确的。本文将从孔子对待社会变革的态度、一生的主要活动以及他的思想体系等三个方面，作出分析，提出看法。

孔子不但反对社会的变革，还妄图恢复反动阶级已经失去的“天堂”

孔子处子春秋（公元前七七〇年——前四七六年）晚期，正当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大变革时期。这时从经济基础一直到上层建筑，有着一系列的

重大变革。孔子是怎样对待这些社会变革的呢？

原来奴隶主贵族在农业上的剥削办法，就是迫使成千上万的奴隶到指定的田地上进行无偿劳动，叫做“籍”。这时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成长，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确立，各国先后改用每亩抽税的办法。原来奴隶主国家的军事费用，是由各级奴隶主贵族和“国人”（国都中的自由民）负担的，按照等级和地区来分担的，叫做“赋”。这时也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各国先后也改用按田亩来征“赋”的办法。孔子对这些经济制度的改革都很反对，认为周公规定的“籍”和“赋”的办法都很合理，不应违反（《左传》哀公十一年、《国语·鲁语》）。

在经济制度变革的同时，上层建筑也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变革，主要表现为“礼”的崩坏和“法”的兴起。

“礼”原是奴隶主贵族用来奴役人民的工具，也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的手段。这时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奴隶主大头目天子、诸侯权力的衰落，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诸侯不但不朝贡天子而僭用天子之礼，卿大夫不但夺取国君的权力而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孔子看到这种僭礼行为，十分恼怒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

佾》)“法”原是奴隶主用来镇压人民反抗的手段。奴隶主为了操纵生杀之权，常常随心所欲，临事制定刑法。这时由于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成长，有些倾向进步的人就主张把法律条文公布，对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加以限制。孔子对此也大为反对，认为这违反祖宗的“法度”，破坏了贵贱的等级秩序，其后果将要使国家灭亡(《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一面强烈反对破坏旧的礼制，一面又强烈反对新的法律条文的公布，说明他在当时上层建筑的变革中，是个十足的顽固派。

阶级斗争是推动当时社会变革的动力。广大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摧毁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使得封建生产关系逐步代替奴隶制生产关系。代表地主阶级的新兴势力，就乘机夺取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权力。

“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就标志着地主阶级夺权斗争的胜利，新的封建政权的建立。孔子在这场夺权斗争中，不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一边，而是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一边。公元前四八一年，齐国代表新兴势力的陈恒(即田成子)杀掉了奴隶主总头目齐简公，孔子特为斋戒沐浴，朝见鲁哀公，要求鲁国出兵讨伐(《论语·宪问》、《左传》哀公十四年)。孔子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从这里可以看得一

清二楚，他不是个造反派，而是个反对造反的顽固派。

孔子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反对造反，鼓吹复旧。他不但要挽救奴隶制的灭亡，而且妄图把历史车轮拉回去，恢复西周（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前七七年）奴隶制全盛时期的政治体制。

礼乐、征伐是奴隶主贵族统治用的两种主要手段。西周对代这两种主要手段的权力掌握在天子手里，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春秋初期，天子权力衰落了，权力掌握在诸侯手里，即所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春秋后期，诸侯权力又衰落了，权力掌握在卿大夫手里，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在鲁国，权力更落到了卿大夫的家臣手里，即所谓“陪臣执国命”。这样奴隶主贵族的政权从上而下地一层层倒塌，是奴隶制崩溃的必然结果。但是，孔子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天下有道”的表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以及“陪臣执国命”是“天下无道”的表现（《论语·季氏》）。他把历史看成一代不如一代，是从“天下有道”越来越变为“天下无道”。这种倒退的历史观，就是为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复旧制造理论依据。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是西周奴隶主国家的创建者，周公更是“礼乐”的制定者。孔子非常自负，以文、武、周公之道的唯

一继承者自任，就是妄想把历史拉回到西周时代去。不甘心失败和阴谋复辟的反动派，从来都是留恋已经失去的“天堂”，“以古非今”的。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表的孔子，就是留恋着已经失去的西周时代的“天堂”。当他在匡的地方被人围困的时候，还自我吹嘘：文王死后，传文王之道的就是他，如果天不想让文化毁灭，匡人就奈何他不得。直到晚年，他还哀叹很久没有再梦见周公。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判断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看他对当时社会变革的立场和态度，是个关键。孔子在新旧社会的变革中，立场态度十分鲜明，极力反对顺着时代潮流的变革，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而妄图恢复奴隶主贵族已经失去的“天堂”。

孔子投机取巧的政治活动失败了，还妄图通过意识形态方面工作来实现其反动政治目标

孔子一生的主要活动，都是为了恢复没落奴隶主贵族已经失去的西周时代的“天堂”。

孔子一生遑遑奔走，想找到个主顾，出卖他的知识才能，实现他的奋斗目标。他毫不隐讳地说：要卖

掉啊！要卖掉啊！我是在等待识货者哩！（《论语·子罕》）他为了争取得到主顾重用，打出包票说：如果谁用我的话，一年可以见效，三年定可成功（《论语·子路》）。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公元前五〇二年，鲁国三家的家臣发动“叛乱”，季孙氏的家臣公山不狃（即公山弗扰）在费（今山东费县西南）准备“叛乱”，秘密派人来召孔子，孔子就想去，他的弟子子路反对，孔子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这对孔子想去，是不是想帮助“乱党”造反呢？不是的。孔子说：“吾其为东周乎！”就是想借此机会把文、武、周公之道推行到东方来。当对阳虎、公山不狃等人发动“叛乱”，是想谋杀季孙氏，推翻三家卿大夫的统治。这和孔子反对“陪臣执国命”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怎么可能利用来推行文、武、周公之道呢？汉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就曾指出这点来质问孔子，认为孔子想投机取巧，是“言无定趋”、“行无常务”，言论行动缺乏一定的目的性和原则性（《论衡·问孔》）。

不久孔子做了鲁国的司寇（相当于近代的司法部长），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堕三都”。三都，是叔孙氏的郕（今山东东平东南）、季孙氏的费 and 孟孙氏的成（今山东宁阳东北）。当时盘踞在三都的三家家

臣势力很大，不断发生“叛乱”，三都的堡垒已成为三家严重的威胁。三家卿大夫为了除去威胁，鲁国国君为了削弱三家的力量，都要平毁这三个堡垒。因此孔子以司寇的职位，再加上子路正担任“季氏宰”（季孙氏总管家）的职司，就可以发动“堕三都”了。在平毁叔孙氏的郕之后，将要平毁季孙氏的费的时候，盘踞在费的公山不狃就起兵袭击鲁国国都，被孔子派人带兵打败驱逐，才把费平毁了。接着将要平毁孟孙氏的成，因为盘踞在成的公敛处父和孟孙氏取得谅解，没有堕成。孔子也就无可奈何。后来鲁定公亲自带兵围成，也没有攻克。堕成的计划就此作罢。

孔子发动“堕三都”，目的在于恢复鲁国奴隶制统治的旧秩序。按照文、武、周公之道，既要反对“政在大夫”，更要反对“陪臣执国命”。孔子在做鲁国司寇期间，曾取得了掌权者季孙氏的信任。这时他能做的符合子周道的事，只有联合国君和三家卿大夫一起去打击“陪臣”势力，发动了“堕三都”事件，但是也没有全部成功。孔子就干不下去而离职了。

孔子代表没落奴隶主，想寻找机会恢复已经失去的西周时代的“天堂”，但是历史是不会倒退的，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孔子的政治活动失败了，是否就罢休呢？不要休，还要干。别人骂他不识时务，“是知

其不可而为之者”，他自己却吹嘘“不知老之将至”。他带着门徒周游列国，到处游说，却到处碰壁，弄得“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还是要干下去。怎样干呢？他在政治舞台上已经没法干下去，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努力干。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取得了下列两方面的成果：

第一，聚徒讲学，创立了儒家这个学派，扩大了保守派的队伍。

据说，孔子的弟子多到三千人，其中高足弟子有七十多人。这七十多人一再传授弟子，逐渐形成儒家这个学派。儒家到战国时代（公元前四七六年到前二二一年）就成为“显学”之一，特别是齐、鲁一带很盛行，成为儒家根深蒂固的老巢。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博士官”，多数博士都是齐、鲁地区召来的儒生，因而在秦都咸阳爆发了一场法家“厚今薄古”和儒家“以古非今”的斗争，秦始皇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有力措施。在楚汉战争中，刘邦打败了项羽，楚地全都降汉，只有鲁这个地区不降。刘邦派兵进攻，看到许多儒生还在讲诵《诗》、《书》，学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史记·儒林列传》）。后来司马迁到曲阜考察，还看到孔子庙堂上陈列着车服礼器，许多儒生在学习礼乐，引得他留恋徘徊不能去。

由于孔子聚徒讲学，着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工作，儒家成立最早，人数众多，流传长久，对此后二千多年的上层建筑起着深远影响。

第二，编书立说，制造了“以古非今”、鼓吹复旧的理论依据，扩大了保守派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影响。

孔子自己没有著书，只是对古代文献作了整理和编选的工作。他把上古历史文件删订成《书》（《尚书》），把周代诗歌汇编成《诗》（《诗经》），把鲁国春秋时代编年的历史记载修订成《春秋》，用来作为教本，后来就成为儒家的经典。当时儒家和墨家都编有《书》的选本，内容是不同的，各自有其编选的政治标准。今本《尚书》出于孔子及其后学编选是很明显的。在二十八篇《尚书》中，《周书》要占一半，大多数是西周初年的历史文件，其中十篇记载着周公的长篇大论，宣扬的就是文、武、周公之道。《春秋》讲究君臣之间的名分，所谓“《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它用正定名分的“笔法”，妄图把已经革新的社会现实政变过去。尽管这时周天子已经不能发号施令，但是在《春秋》上，还是装模作样地行使着权力，所谓“《春秋》，天子之事也”。它还针对妨碍奴隶制统治的“邪说暴行”，极力加以贬斥，目的在于使“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

公下》），从而维护大奴隶主天子、诸侯的统治。孔子编选这些教本，政治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制选“以古非今”、鼓吹复旧的理论依据。后来孔孟一派儒家就根据这些东西来“以古非今”，反对当时政府的变革法令，所以商鞅在变法的时候就主张焚烧《诗》《书》，秦始皇为了打击奴隶主贵族复辟活动，断然来取“焚书坑儒”的措施。

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表的孔子，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反动的。他想靠投机取巧找寻主顾来实现他的反动政治目标是失败了，还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大肆活动，妄图通过这方而工作来达到他的反动政治目标。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孔子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代表反革命阶级大力做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人，因此历来反动阶级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必然要推崇这位祖师爷，必然要打起尊孔的旗号来。

孔子不但要通过意识形态方面工作挽救旧制度的灭亡，还妄图利用旧的上层建筑把已经革新的社会现实再改变过去

孔子弟子及其后学所编的《论语》，就是孔子的

言论集，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他的思想核心是“仁”，“仁”的主要内容是“克己复礼”，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把言论行动纳入“礼”的规范中，从而维护奴隶制的统治。

当时奴隶主贵族讲究的“礼”，起着两方面作用：一方面用来维护贵族的等级秩序，把奴隶主阶级团结起来，以便加强对奴隶的统治。另一方面就是要使奴隶们按照奴隶主制定的规矩行事，俯首贴耳地顺从奴隶制的统治，不起来“犯上作乱”。所以《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①。孔子所鼓吹的“仁”，就是要从这两个方面发挥“礼”的作用。他把“孝、弟（悌）”看作“仁”的根本，因为孝顺父母、敬爱兄弟，是维护贵族内部团结的重要手段。他把“忠、恕”看作推行“仁”的主要方法，因为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又是加强贵族内部团结的一种手段。他把“恭（恭敬）、宽（宽大）、信（信任）、敏（敏捷）、惠（给予恩惠）”作为推行“仁”的五种手段，也是为了调整奴隶主阶级的内部矛盾，调和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他说，“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就是企图通过小恩小惠来使人民俯首听命。他还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

不偷”（《论语·泰伯》）。这和孟子所说“亲亲而仁民”（《孟子·尽心上》），是一样意思。这是说，贵族能够很好对待亲属，人民就可以被“仁”所感化；贵族的故旧不被遗弃，人民也会被感化而不做刻薄的事。由此可见，孔子认为“仁”不但可以起团结贵族的作用，还可以起感化人民的作用，既可以解决奴隶主阶级内部矛盾，又可以解决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维护奴隶制的统治。这就是妄图通过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挽救当时摇摇欲坠的奴隶制。

孔子和许多奴隶主贵族一样鼓吹“天命”，把奴隶主阶级的意志说成“天命”，把“天命”说成不可抗拒的绝大权威。他提倡“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大人”是指大奴隶主天子、诸侯之类，“圣人之言”是指大奴隶主代表人物周公之类的言论。孔子这样把“三畏”并提，“天命”实质上就是“大人”的意志、“圣人”的说教，无非要人们拜倒在大奴隶主的脚下，服从其统治，而不起来“犯上作乱”。

孔子为了维护奴隶制，论证奴隶制的合理，就把人分为四等：“生而知之”是上等，“学而知之”是次等，“困而学之”是再次等，“困而不学”是下等。他把大奴隶主“圣人”看作“生而知之”的上等人，

把劳动人民看作“困而不学”的下等人。孔子这样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无非要证明聪明的上等人 and 愚笨的下等人都是天生的，因此大奴隶主是天生的统治者，奴隶是天生的被压迫、被剥削者。他还胡说什么“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就是说，奴隶主永远是奴隶主，奴隶永远是奴隶，不可能有所改变。

这时由于奴隶主贵族政权从上而下一层层倒塌，天子、诸侯已丧失原有权力，只存虚名，这种名存实亡的现象，是奴隶制崩溃的必然结果。但是孔子倒果为因，认为旧秩序不能维持是由于“名不正”引起的，就提出了“正名”主张，企图用纠正名分的办法来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周礼，从而恢复奴隶制的旧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第一个君字、臣字、父字、子字，是指事实上为君、臣、父、子的具体的人，就是“实”；第二个君字、臣字、父字、子字，是指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就是周礼所制定的名分，就是“名”。孔子就是要用周礼制定的“名”来纠正当时的“实”，从而恢复西周奴隶制全盛时期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妄图利用旧的上层建筑，把已经革新的社会现实再改变过去。

孔子把他的最高政治理想叫做“道”，“道”就

是他的最终奋斗目标。曾说：“朝（早上）闻道，夕（晚上）死可矣”（《论语·里仁》）。这个“道”，不是孔子的新创造，就是文、武、周公之道。怎样能够把当时已经革新的社会现实，再改变过去，变为符合文、武、周公之道呢？他指出了一条“变”的途径，就是：“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当时齐国的经济、政治都比鲁国进步，自从陈氏（即田氏）掌握政权之后，封建制已处于优势地位。鲁国比齐国落后，尽管经济制度作了政革，封建制生产关系不断成长，但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的力量还很大，“周礼”还多顽强地保存着，所谓“周礼尽在鲁矣”。鲁国贵族之间内讧有个特点，每一方战胜对方，一般不杀死而让出走了事；对于大贵族，失败后，不仅允许出走，还要替他另立后代，就是为了“继绝世”，维护着奴隶主贵族统治的传统。因此鲁国三家卿大夫长期并存，虽然他们逐渐向地主阶级转化，也还保存着浓厚的贵族色彩；鲁国国君不仅名义上长期存在，也还有一走的实力。这和“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局面是不同的②。孔子要从“齐一变至于鲁”，就是要从封建制占优势的局面变为奴隶制上层建筑顽固保存的局面。孔子要从“鲁一变至于道”，就是要从奴隶制上层建筑顽固保存的局

面变为奴隶制全盛时期的局面。这是一种主张开倒车的“变”，反动的“变”。这种主张开倒车的“变”，实质上就是妄想通过恢复旧的上层建筑，把已经革新的社会现实再改变过去。也就是要从上层建筑下手，妄图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

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是保守的，反动的；是反对革新，主张复旧的；是主张通过旧的上层建筑，把已经革新的社会现实再改变过去的。因此历来反动阶级，为了反革命复辟，或者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做工作，制造反革命舆论，都要利用他。叛徒、卖国贼林彪本来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野心家、阴谋家，为什么也要大肆吹捧孔子、孟子呢？就是要请出历史上的亡灵来为他们的反革命复辟服务。“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

孔子之所以会被历来反动阶级吹捧为“圣人”和“万世师表”，有这样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孔子是个没落的反动的奴隶主阶级的突出代表，是个反对革新、主张复旧的极端保守派，是个失败了妄再干、至死不悟的顽固派。他不但反对革新，主张复旧，而且用尽心计，妄图恢复反动阶级已经失去的“天堂”。那些利用孔子来制造反革命舆